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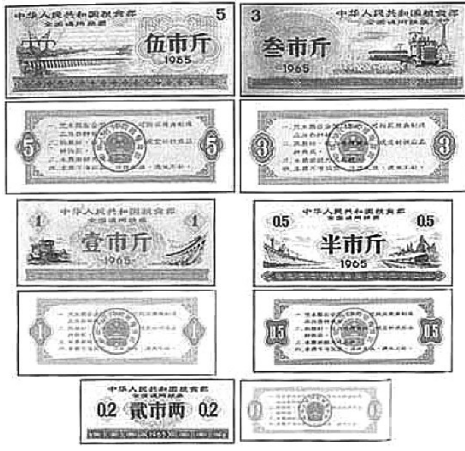
纪念改革开放30年“潮动中原”系列报道之二十五

# 一组消失的词汇和一座城市的三十年

本报记者 余茂英 文/图



曾经风靡一时的“BP机”



曾经全国通用的粮票

10月8日,第十届亚洲艺术节在河南顺利闭幕,中原厚重的文化底蕴,热情好客的河南人民,给来自亚洲各国的艺术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艺术节期间,记者多次走上省会街头,在欣赏各国精彩艺术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30年来郑州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

在对市民的街头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年龄稍长的市民,与年轻一些的市民相比,在词汇运用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首往昔,30年来,有许多词汇涌现,风靡一时,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又渐渐消失在历史中。

语言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可以折射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记者通过随机采访,从不同年龄段的市民语言中,遴选出了一组已经消失的词汇,这些词汇都曾极其流行。通过对这些词汇所关联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回顾,来折射改革开放30周年省会郑州的巨大变迁。

## “育红班”

上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人,对“育红班”这个词大多还保持着清晰的记忆。1974年出生,目前在某研究机构工作的陈先生对记者说:“那时候,郑州乃至全国,所有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机构,统一被称为‘育红班’。”

“育红班”这一词汇带有鲜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代特征,在70年代出现,并一直沿用至80年代初期,才逐渐被“学前班”、“幼儿园”等词汇所取代。陈先生回忆道:“那时候,‘育红班’所教授的课程,内容较为单一,歌曲多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而《半夜鸡叫》、《鸡毛信》是常听老师讲的故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全新的思想路线贯彻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幼儿教育的内容,乃至整个幼儿教育的理念也要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而首当其冲,是要为幼儿教育系统正名,“育红班”这一称谓,由于承载涵盖了过多的意味,而从人们的语言中渐渐消失。

陈先生道:“我们同院的,比我小几岁的80后,就不再知道‘育红班’这个词了,他们多称自己学习的地方为‘学前班’,后来又开始称之为‘幼儿园’。虽然仅仅差这十几年,他们的儿歌可比我们‘育红班’时丰富多了,内容更加幼儿化,非常符合儿童的接受能力。授课内容也有相应调整和增加,传统历史故事与国外的优秀童话都有涉及。”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时至今日,郑州的幼儿教育机构和又衍生出了形形色色的新“品种”。除了承担一般学前教育任务的“幼儿园”外,围棋、舞蹈、器乐、绘画、口语、外文等各种幼儿培训班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城,以供望子成龙的家长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

陈先生为6岁的女儿报了绘画和围棋两个培训班,他说:“培训班上的那些孩子可都不小啊,啊,

说不定哪个小不点就是个钢琴高手、围棋天才。”

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郑州市还有一种全新的幼儿教育机构应运而生,这就是“午托部”。“午托部”是为双职工家庭服务的一种幼儿托管形式,如今在郑州已是遍地开花。年轻父母的工作时间多是朝九晚五,中午没有时间照看孩子,支付一些费用把孩子交给“午托部”,是个不错的选择。

从“育红班”到“幼儿园”,再到“培训班”、“午托部”,幼儿教育机构名称的变迁,折射出一座城市、一个时代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

## “下海”

“下海”这个词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是指大多数人尚在计划经济的温室中观望时,一部分人从国有单位辞职,从事商业活动的行为。最初,“下海”之人还是颇有些“弄潮儿”雄风的,然而时至今日,人们都已经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海”和“岸”的界限早已难以区别,所以“下海”这个词在人们的语言中也渐渐地消失了。

中国的“下海”经商大潮主要发生在1981年、1984年和1992年等几个年份。

1981年,知青返乡,国有企业“停薪留职”,这两大因素导致社会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但此时的“下海”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业行为。

围棉五厂的老职工王女士回忆说:“当时其实没什么过多的想法,就是工厂效益不好,孩子要上学,老人要赡养,只好自己想点门路赚钱。”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各项政策搞活后,王女士先后卖过茶叶蛋、盒饭,直到后来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王女士开了一家饭馆,经营至今,生意一直很红火。

1984年和1992年的“下海”大潮则与邓小平同志的两次“南巡”紧密相关。1984年元旦过后,邓小平开始第一次“南巡”,随即,中央宣布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并调整多项方针政策以鼓励个人创业,开展市场经济。郑州也出现了壮观的“孔雀东南飞”的景象,大批郑

州有志青年奔向了南方的热土,开始拼搏创业,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企业家。这一年,后来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

郑州大学工学院90届毕业生张迅华是第三次“下海”浪潮中的一员,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他在90年代初期,放弃了在建筑业的安稳工作,选择了一个当时还鲜为人知的经营项目:养鳖。张迅华对记者说:“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讲话后的‘两会’期间,我读到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深切感受到了中央改革举措的力度,从而更加坚定了自主创业、投身市场经济的决心。”

张迅华的“下海”另辟蹊径,在新鲜的藏鳖养殖产业中,他获得了丰富的回报,也拉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他的中原巨鳖农庄,后来发展成为在业界很有名气的中原藏鳖良种繁育有限公司,由此,河南省也被称为藏鳖的“第二故乡”。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计划经济逐步解体,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下海”反映的是个体所选择的一种全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下海”的人群,是最早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经受市场竞争考验的一批人。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定现阶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说明在跨入新世纪的前期,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无论从深度、广度还是力度看,都取得了重大进展,越来越深入地触及深层次的问题。“下海”经商,自主创业,不再像最初,是少数人不得已的被动决定,而是逐渐成为更多人主动的选择。当“下海”不再是一种新鲜现象之后,这个词也慢慢被人遗忘。

## “BP机”

与其他大众通讯工具相比,“BP机”算是比较“短命”的一种,用供职于某私营企业的市民刘广锋的话来说,就是“来也汹汹,去也匆匆”。

中国联通从1986年在河南省开办寻呼业务以来,在1998年达到鼎盛,用户高达280多万。

刘广锋对记者回忆说:“我在1998年刚参加工作,就立刻买了一台摩托罗拉的汉显寻呼机,当时办公室只要‘滴滴’一响,所有的人都伸手摸腰,几乎人人腰里都有一台‘BP机’,有人还有两台,汉显机的号码是用来给至亲好友联系的,数字机的号码则用来应付那些不重要的人。”

郑州市民想必都有着他一样的记忆,当时,“有事呼我”这句话,在郑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与固定电话相比,寻呼机这种全新沟通方式,使人们在生活中切实体会到了科技带来的快捷和便利。

只是信息技术革命的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进行,我国科技创新力度的不断加强,而通讯技术领域的创新更是日新月异。当“BP机”和寻呼台风光无限时,手机异军突起,以更强大的科技支持和科技优势进入通讯市场。“BP机”的功能,手机都具备,这对寻呼业来说,无疑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不过在手机问世初期,“BP机”还曾“负隅顽抗”了一段时间。刘广锋说:“当时手机叫‘大哥大’,用的是模拟移动电话网,很贵,一分钟通话费要七八块钱,所以看到别人用‘大哥大’,我们工薪阶层也有羡慕的份。”

由于最初的手机价格及使用费用昂贵,所以“BP机”暂时在市场上与手机并存。当时还有个广告叫:“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1996年,GSM网开通,手机日益平民化;2001年6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完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昂贵的“大哥大”退出通讯市场。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收入的增加,手机逐渐普及,短短几年内的时间内,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在郑州遍地开花,从“贵族化”迅速过渡到了“平民化”。

刘广锋说:“最初的手机功能很少,所以一些人还‘依依不舍’地保留着腰间的‘BP机’,后来手机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宜,而且出现了短信功能之后,‘BP机’的‘末日’就真的来临了。”

如今,越来越多样的即时沟通方式不断出现,供人选择。手机、E-mail、QQ等全新通讯形式,继续着信息技术时代的进程。还记得当时“BP机”最辉煌时,有一家寻呼台的广告词是“一呼天下应”,那样的鼎盛,在日新月异的科技面前则迅速衰落,成为永远的历史。

2005年10月10日,中国联通河南分公司关闭其在河南省内的所有寻呼网络,126寻呼台在河南走过了它19年的历程,终于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2007年3月2日,中国联通公司申请停止北京等三十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寻呼服务,至此,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善的寻呼网络和用户群体的联通公司,正式退出寻呼业,这标志着辉煌一时的“BP机”基本退出市场,成为历史。

“BP机”作为一种即时通讯工具,从盛极一时到悄然隐退,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如今,人们可以用各种快捷的方式,随时随地与世界自由沟通,很难想象就在上世纪末,略显笨拙的寻呼业务和“BP机”,居然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新鲜的沟通体验。通讯工具的变迁,反

映出的是这些年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 语言嬗变折射社会变迁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中,词汇与社会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反映社会变迁的功能也最完善。

记者在采访中深深地体会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期,人们日常词汇的发展变动尤为迅猛。社会结构、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的变化,都必然反映到人们日常运用的词汇中。许多消失的词汇,都成为以往时代的历史留痕,而不断涌现出的新词汇,则反映着当下全新的精神风貌。

除了本文上述的“育红班”、“下海”、“BP机”之外,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郑州乃至全国,曾经风靡一时,随着时代的进步又逐渐消失的词汇,还有很多。

这些词汇的涉及社会的重大事件、焦点问题,比如“下岗职工”。如今,随着劳动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再就业指导中心所提供的培训中介服务逐渐奏效,通过劳动力市场、民办职业机构和社区劳动保障站,获取岗位信息、参与市场竞争,其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也向失业保险接轨。“下岗职工”这次词汇也慢慢在人们的口语中消失。

有的涉及法律问题和经济问题,比如“投机倒把”。1997年《刑法》修订时,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名,这个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词汇从此淡出历史。

还有的涉及生存问题,比如“粮票”,这一计划经济时代凭证分配的产物,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商品供应的充足,“粮票”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票据,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而是进入收藏市场,成为了历史的遗物。

还有一些词汇仅仅是涉及生活的一个小层面,比如“露天电影”、“雪花膏”、“霹雳舞”、“拍电报”、“录音机”等,这些词汇都曾经反映了一段时间内的整体社会风貌和人民生活水平。

一组词汇的消失与更迭,忠实无误地记录了一座城市30年间物质精神生活的巨大变化;如影随形地折射了一个国度在30年间所创造的历史奇迹。



露天电影承载了一代人的美好回忆

## 时政点击

### 救救柑橘之后还要再救救鸡蛋吗

柑橘生蛆引发消费恐慌,鸡蛋里挑出三聚氰胺,生活果真精细得紧,也脆弱得紧,在消费者已经紧张不起一根头发丝的神经上,人们千疮百孔的心理防线,仍被一再洞穿。

一条短信酿发“社会惊闻”,三聚氰胺居然可以潜入鸡的卵里,尽管有教授专家以不同的方式一再背书无伤健康大雅,但对于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的大众来说,除了恐慌之外,确实别无他法。到现在,人们也弄不懂三聚氰胺是如何进入奶粉变成蛋白的;到现在,人们已无力去弄懂新鲜鸡蛋中何以有超标88%的三聚氰胺;到现在,人们弄懂了柑橘蛆虫对人体无害也没办法说服自己去消费。

无论是一点火星或是一场爆炸式的食品安全危险曝出,几乎都是消费信任的崩解,足见消费者犹如惊弓之鸟的创巨痛深。因而,每一次食品危机之后,必有挽救行业的哀哀之语。

救救奶粉之前,是救救孩子的杜鹃泣血。三鹿毒奶粉丑闻,伤害已大面积发生之时,信息仍被严实实地包裹,直至事情败露到地方官员置人民生命健康于不顾,视人民疾苦呼号于罔闻,使事态从犹可转为一发不可收拾。奶粉与奶业的逐步回地,是自己顶着业内公认的“潜规则”,顶着质检制度的施恩,一步一步走到与消费者为害为仇的境地,因此奶粉只有自新才能自救。所谓救救奶粉,不是自怜,而是假自怜之名以欺世,直到今天,我们犹未闻与三聚氰胺有染的奶企正式而真诚的道歉。

四川广元柑橘蛆虫暴发,大实蝇疫情及时为当地政府控制是实情,但此一信息未被主动公开,致使“不要吃橘子”的短信流行,此后四川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指短信为“谣言”。而太原、济南、乌鲁木齐、郑州

等地相继发现柑蛆,恰恰击中了消费者心中的隐忧,又使政府“辟谣”产生巨大的心理反差——除了摆在面前的不可否认的事实之外,我们总是首先得到被称之为“谣言”的解释,所以恐慌总比不恐慌要好,毕竟本能也是一种保护。

由此直接导致了与疫情无关的湖北柑橘全面滞销,柑橘价格在京城跌落一半亦少有人问津,橘农只能看着成熟的柑橘烂在枝头,若任由事态发展,湖北橘农损失将达15亿。相对奶粉,湖北柑橘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救救柑橘比救救奶粉要正义得多。

若无奶粉丑闻于前,公众的食品安全感不至于如此脆弱,对于权威信息的信任不至于如此沦丧。奶粉丑闻已使公众对于危机信息的包裹严重厌恶,对食品安全被动应对而非主动预警的制度十分反感,回过头看,事发之初,政府方面指短信为谣言是对社会信任的严重打击,辟谣的公信力敌不过谣言的公信力,或者说,越辟谣,谣言就越有公信力。

“你说无害,我就是不吃”,平凡生活,如此惨烈心情,除了表达不信任之外,其逆反心理亦是毒奶粉事件以来不满的宣泄。与其说柑橘为流言所累,毋宁说柑橘大实蝇疫情是在为奶粉丑闻承担后果;与其说橘农无辜受损、消费者无理性地惊惶,毋宁说现实在以另一种方式对产生奶粉丑闻的制度缺陷进行批判。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以民族的进步获得补偿。如果暂时没有进步作为补偿,一个民族在伤害中失去的,会以不自觉地对于不正当现实的反动表现出来?如此,救救柑橘,还需从制度与心理阴影的源头做起。

晓宇



## 漫画:为官如在鸡蛋上跳舞

山西临汾某县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锒铛入狱。我们现在是在鸡蛋上跳舞,当太平官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县长大人想必是有感于此前的“太平官”日子恐怕不再,感于再“搞不好”或许就难以逃脱问责了……百感交集,故作此嗷嗷哀鸣。是想以这样的“哀鸣”来博取人们的同情吗?那实在也太矫情了吧。

文/小乔

## 教育惩戒的自由裁量权需要一个裁判

即将过去的10月,对于教师职业而言夹杂着一丝悲凉,发生在山西和浙江的两起“猥亵案”引发社会对于这一职业乃至教育本身的深刻反思。针对备受关注的教师受害案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表示,政府、社会和教育工作者应积极采取措施,切实保护教师安全。另外,教师正当使用的惩戒并非对学生的体罚,不提倡迁就学生一切行为。(《北京晨报》10月28日)

我认为,教育惩戒是完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未成年人的人格健康和谐发展,缺乏正当惩戒的教育是有缺陷的教育。但必须厘清的是:教育惩戒权是一种权力而非权利,是教师用于惩罚违纪学生、生活规范的学生的权力,针对的是学生违反规范的行为,是基于教师职业地位而拥有的一种强制性权力。

事实上,教育惩戒权以教育管理的面目出现,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惩戒过程中,教育作为具体执行人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方式方法和惩戒力度一个把握不好,就很容易从正当惩戒异化为体罚或变相体罚,侵犯处于弱势一方的学生权利尊严。既然教育惩戒是一种权力,就需要权力的监管,而我们总是“强调”要进一步明确赋予教育的正当惩戒权,却无形中忘记了关键的一点:谁来给教育惩戒的自由裁量权做裁判?或

者说,需要反问的是,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在制定校规校纪时、在行使教育惩戒权时,有没有充分考量过学生的合法权利、人格尊严和性格天性?制度中有没有对教育惩戒提出具体的规范和监管?

教育惩戒权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法律明确的教育职业权力。但与此同时,制度又对惩戒的处理方式、行为理念、具体情况等进行了细化和人性化的规范,譬如美国,惩戒学生要看他违反校规的程度有多大,实施某种惩罚时,要看他身心健康的承受能力,还要考虑性别和年级。再譬如新加坡,校长、副校长和纪律事务长有权用藤条对违纪学生进行体罚,但对对象限于男生,部位限于手心 and 屁股,必须有见证人在场,体罚后写成书面报告,并立刻通知家长等,规定十分详细而明确……与之相比,我们的教育惩戒显得非常粗暴和僵硬,也因缺乏有效监管而呈现出个性化的自由裁量,带有很浓的个体情绪化。我想,这是教育惩戒与体罚“纠缠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一位教师网友说得好,教育惩戒是权力也是一门艺术,应该以爱为前提,惩戒是为了完善孩子,使他变得更好,而不是把学生当成发泄教师情绪的对象。显而易见,要想让教育惩戒行走在“正当”的路径上,释放出应有的教育价值,就必须先给教育惩戒权立立规矩。

陈一舟

## 茅盾文学奖别成了十全大补丸

10月25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有四部作品入选:贾平凹《秦腔》、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麦家《暗算》、周大新《湖光山色》。

作为中国第一个设立的个人名义的文学奖,20多年来,茅盾文学奖是中国现实主义创作乃至中国文学的一种鼓励与慰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它的影响力有限,评论标准也饱受争议。

就拿这次获奖的作品为例,评论家认为有深刻内涵的《秦腔》,没多少读者买账,因为不好读;读者认为好读的《暗算》,但是在一些评论家看来,不过是一部被影视炒作成名的通俗演义。

那些所谓深奥的,动辄50万字、100万字的“文字井喷”,仿佛越写得长,就越玄之又玄;那些所谓好读的,却往往是与出版社和影视合谋,炒作排行榜的结果,虽然故事性强,娱乐性高,但艺术价值大都平庸。

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郅元宝所说,书刚刚出版,国内外的媒体就报道说该书居于排行榜首位,难道中国读者普遍都有如此神奇的阅读速度?

深奥的没人读,平庸的没读头。个人的审美标准不一,无可厚非。但是,茅盾文学奖,作为一个权威奖,却在这之中左右徘徊,进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丧失了独特性,也就意味着丧失了权威性。

《秦腔》太深奥,姑且不说它。但此次《暗算》的入选引来诸多议论,有网友甚至认为茅盾文学奖像是一个食之无味的鸡肋,一颗“十全大补丸”。许多读者也反映,“真没看出来为啥这本书能获得,就是些特别的故事,加在普通人不太熟悉的背景中”。

因为茅盾文学奖既不是历史奖,也不是影视文学奖,而是

现实主义文学奖。虽说,要兼顾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但是“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作品,尤应重点关注”。侧重于社会新人、时代精神的反映,正是茅盾文学奖的创作追求。

他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的新方向,善于用典型形象集中反映中国的社会风貌、人民生活,同时,又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然而,我们在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作品中,很难想到现实主义生活风貌,更毋庸说理想主义光芒了。

历经七届茅盾文学奖,也就前几届得到比较多的认同,包括《许茂和他的儿女们》、《芙蓉镇》、《沉重的翅膀》、《钟鼓楼》、《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而在改革开放30年的后半期,茅盾文学奖其实有失语之嫌了。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出了当代中国现实主义创作的无力:反映社会底层的小说,要么几乎全部是黑暗丑陋的,要么几乎全部是扭曲变形的,没有一点亮光;这面镜子也反映出新世纪文化环境的变迁:文学要么彻底精英化,让百姓看不懂,要么彻底大众化,向大众趣味妥协,始终找不到一个准确的历史与时代结合的切入点。

一些评论家真诚呼吁,茅盾文学奖要摆脱目前的尴尬,最好的出路还是回到茅盾生前最初的朴素愿望上去,既不要好高骛远,也不必“十全大补”。无论如何呼吁,也无论如何发展,茅盾文学奖不能离自身越来越远,不能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吕刚